

# 再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与论据\*

——对“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质疑

罗仁地 著 黄成龙 宋 佳 译

[提要]最近,有人对大家所公认的汉藏语系提出质疑,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应该不断地对一些基本的假设提出质疑。本文就把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议题进行验证。由于该议题论据和实证不足,本文认为要把公认的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议题缺乏说服力。

[关键词]汉藏语系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论证法 跨喜马拉雅语 汉语语言学 藏缅语语言学

## 一 引言

在过去26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一直主张针对汉藏语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进行更科学化、更尊重语言事实、更具有类型学和理论意义以及逻辑严谨的分析<sup>①</sup>。在 LaPolla (1990, 1993) (还有 LaPolla & Poa (2006) 以及我有关汉语信息结构研究的论文)中,我采用实证法分析汉语<sup>②</sup>,提出证据质疑“主语”和“直接宾语”具有共性的说法,同时指出组配系统的类型 (typology of alignment systems) 也必须涵盖语法上没有组配系统的语言,例如,汉语就是一种纯粹的话题-评述结构<sup>③</sup>。

---

\* 我在2014年10月举行的第47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过这篇论文。想感谢那时为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意见或者感谢我写了这篇文章并且强烈建议我将其刊布的同仁,也感谢 David Bradley, Alec Coupe, Graham Thurgood 和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我还要感谢 Yvonne Tse Crepaldi, Stefanie Stadler 和 Rik De Busser 对我德语文本阅读理解的肯定。

① 我之所以从哲学转向语言学是因为尽管前者有紧密的论据,然而却没有可以依赖的事实性“底线”去确定不同的方法。遗憾的是,那时(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掌控在乔姆斯基唯理主义哲学的手中,并且很多非-乔姆斯基学派的学术著作也充斥着论据问题。这里提及的论文企图让语言学回归到更加科学和严谨的方向。

② 有关汉语可靠而有事实基础的深刻研究早已由赵元任(如1968)提供,但是赵先生的研究不是被误解了就是被忽略了;汉语研究大多数著作是依赖于编造的句子,套用“语言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而不是依赖谨慎的归纳法来进行分析。

③ 之后的研究,例如 LaPolla & Poa (2006),表明塔加禄语和其他菲律宾型的语言也需要被识别为一个独立的组配系统类型,而不是强迫它们穿上“作格”组配系统或者“宾格”组配系统的紧身衣。

在LaPolla (1992a)中,我对在原始藏缅语这个历史层次构拟动词人称标记理论和方法上的合理性提出一些严重的质疑,文中同时展示,使用语言功能和类型学为基础的语法理论进行研究,会有益于我们的研究。我主张在构拟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内部的构拟,要先进行剥离语法化的层面,不要把明显的语法化结果构拟到原始语言中去。文中更进一步指出,进行语言分析的时候,如果只透过观察少量不全面的语料依据,将会导致错误的分析;例如,把藏缅语中有等级序列的人称标记分析成作格标记,导致这种错误分析的原因是研究者只使用第三人称施事者的例子(例如:Bauman (1979),又如DeLancey (1989)把等级序列系统分析为作格)。文中,我指出零标记(这必须涉及强制性而成套的形态标志)和简单的缺乏标记之间的区别,后者在藏缅语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名词短语的“格”标记在很多语言中都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成必用的一套形式,只是在说话人认为需要避免歧义的时候而使用的。在这方面,LaPolla (1992b)进一步讨论了Matthew Dryer (1986)“主要宾语”标记(即受事者和接受者的标记一致)的分析。Dryer认为这种标志在所有呈现这种标记的语言里是一种句法关系标志,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在藏缅语中不能成立,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当施事者与非施事者之间有歧义的时候,该形式不是作为句法关系标志,而是作为一种语义角色标志,所以我把这种标志命名为“非作格”(1992b)或者“非施事”(1994a)标记。

在LaPolla (1995a)中,我提出实证,指出作格标记不可构拟到原始藏缅语或者大部分的中层原始语言,只能构拟到藏语支的原始语言(Proto-Bodish)。我在这篇文章中,再一次提出系统和非系统关系标记的区别。我所提出的系统和非系统关系标记的区别,目前已成热门话题,分别被称为:DAM (Differential A (gent) Marking),和DOM (Differential O (bje)ct) Marking)。在LaPolla (1995b)中,我展示了“有标记”(markedness)和“典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ies)的理论概念如何能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形态系统的历史发展。在那篇文章和罗仁地与杨将领(1996)以及LaPolla (1996)的文章中,我指出了独龙语中间态标记的存在和发展,也举例指出有一些其他藏缅语也有这种标记。

在LaPolla (1994b)中进一步提出,当我们在找汉藏语同源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严谨、谨慎;虽然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词根的不同变体(词族成员),但在接受词根的变体前,必须确认该词根的其他成分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在LaPolla (2000 [2013a]) (另参看LaPolla 2003)我指出,我们常见的方法,即使用随机挑选的词汇列表去建立语族中的亲缘关系,这种做法会导致统计上很有问题的结果。有鉴于此,我建议要坚持使用新语法学派的方法论(Nichols 1996,也可参看Campbell 2003),就是使用形态系统整套的形式作为亲缘关系的依据。使用这种方法,由于随意性降低,因

此得出的统计上结果比较可靠(另参看Ringe 1992, 1995, 1996, 1999)。在LaPolla (2001)里,我引用了人口统计学的证据,认为要正确理解汉藏语的历史发展,我们必须先了解说话人的历史,特别是说话者的迁徙历史,因为了解说话者的迁徙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语系为什么是现在的样貌。忽略民族迁徙的历史会导致对亲缘关系和语系起源地点的错误假设。

在LaPolla (2002)中(原为1994年的会议论文),我提出了词序类型学研究在方法论、论据和解释方面上常见的若干问题,因而主张沿用逻辑上和语料上(也就是尊重语言事实)更严谨的方法。LaPolla & Poa (2006)就根据这方法,针对SVO、SOV、OSV等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由于忽略了语言事实,因此很有问题。所以我在文中强调,当我们在描述词序的时候,我们应该描述个别语言中决定词序的实际原则来讨论词序。在文中我们以汉语、英语和塔加禄语(Tagalog)的原则为例,展示不同语言决然不同的原则。

我在LaPolla (2006a)中强调,语言学所研究的是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而语言结构来源于使用,因此要了解某个语言现在的结构,就必须观察该语言的实际使用,包括整体的交际环境,并且还要能够接受语言结构的多元化,不要很勉强地把某种先入为主的类别套在该语言上。我在2007年,根据这种观点,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如何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语言的范畴,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范畴强加在语言上。在LaPolla (2008a) (刊登于2014)中,我用这个归纳法分析塔加禄语的长篇语料,发现塔加禄语有明晰语法化结果的结构,但是却与其他语言的名词短语或者动词短语都不相对应,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这样的范畴套用在这个语言上是有问题的。

我先前已提出对于句法关系的研究要以更有科学基础,着重尊重语言事实的构式分析法(例如:Van Valin & LaPolla 1997, Ch. 6; 以及LaPolla 2006c-d),继而在LaPolla (2008b) (出版的时候改为LaPolla, Kratochvíl & Coupe 2011)一文中,把以上所提出的方法延伸到分析动词的及物性研究。之后2013b又沿用于分析汉语词类。

LaPolla (2012a)沿袭了LaPolla (2000)有关判断亲缘关系的方法,文中指出四个问题。第一是与认识论相关的问题,即有些学者通常会把他们最熟悉的语言当作是那个语系最保守、最原始的语言,因此在构拟原始语言的时候就会把所构拟的语言构拟成很像他所熟悉的语言(就是所谓“Teeter 的定律”)。第二、有些学者有时候会蓄意挑选对他们学说有利的语料,而忽略不利他们学说的例子。第三、语言的地理位置有时候会影响亲属关系的确定,即有些学者会认为同一个地方的语言理所当然近亲语言。这种观点忽略了民族迁徙的事实:民族迁徙是由不同民族一波一波迁入该地区,迁

来的人的语言后来变得很相似是因为接触而形成的。我指出的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缺乏一种严谨的方法让我们透过统计概率展示已被鉴定的同源成分是该语支独有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又把在2000年提出的方法再次提出来，旨在提出我们要使用整套形态形式，而不是用随机的词汇表去确定亲缘关系。

在LaPolla (2012b) 中，我又回到藏缅语的人称标记问题，反驳一些不赞同我在1992a中和其他文章的观点，我认为那些文章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重点，也就是我们不应该把有明显来源的语法化现象构拟到原始语言，文中也收集并提出其他的证据证明人称标记系统（有很多独立平行发展的人称标记系统，可参看LaPolla (1994a, 2001)）在事实和理论上不应当构拟到原始藏缅语或者原始汉藏语的层面。

在2016的文章中，我再次提出建立更实事求是、更尊重语言事实的语言学，反对不尊重语言事实的结构主义方法 (2016a)，反对在做类型学比较的时候不尊重语言事实，反对把没有呈现出某种范畴的特征硬归纳到该范畴 (2016b)；也强调在做汉藏语语言学研究的时候，要更着重以语料为主的科学做法 (2016c)。

本文又回到讨论严谨逻辑论据的问题，即，针对把汉藏语系改称“跨喜马拉雅语系”所提出的论据进行个案分析。

## 二 个案研究

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George Van Driem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例如Van Driem 2002, 2005, 2011, 2014），提出我们对汉藏语系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最顶端的分支是汉语和藏缅语（Benedict 1976, Bradley 1997, 2002; Matisoff 2003, Thurgood 2017））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汉语不能形成和藏缅语对立的一个分支，并且认为我们不应该使用“汉藏语系”这个名称，应该使用“跨喜马拉雅语系”这样的名称概括该语系，他还主张该语系的起源地是喜马拉雅地区。挑战一些固有的假设自然是很好的，特别是如果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语料或者能提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新论据。

Van Driem在1997年拿出一些语料试图用来支持他当时提出的“汉-藏（Sino-Bodic）”观点，认为他所谓的“藏语支”（本质上是林布语和其他基兰特语支的语言）和汉语最近亲。这种说法已遭到马提索夫（Matisoff 2000）在方法上和语料依据上的全面反驳<sup>①</sup>。对于马提索夫的反驳，Van Driem 并没有接受（2005, 2014: 23），但是之

<sup>①</sup> 又可参看 Benedict (1976)，该文驳斥了汉语和藏语最近亲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源于对词典的偏见：因为汉语和藏语都有卷帙浩繁且历史久远的字典，如果只是随意翻找字典找到同源词就判断亲缘关系，那么比起其他语言，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在这两种语言的字典中找到同源词。

后也没有拿出任何能被科学评估的语料来支持他的说法,相对的,他所依靠的是有问题的论据。本文将针对Van Driem最新发表的文章(2014)中所提出的论据进行剖解,主要目的在于激发语言学界,对历史语言学研究什么才是构成有效论据这个议题进行严肃反思。

1. Van Driem的主要论据是说1823年,一位自学的亚洲学家Julius Klaproth<sup>①</sup>确认出一个语系,也就是Van Driem所说的,之后命名为“藏缅语系”,而汉语、藏语以及缅语作为同级亲属语言出现在该“语系”的谱系下。Van Driem认为Klaproth所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接收Klaproth的观点,但Van Driem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Klaproth的“藏缅语系”之说,也没有说清楚到底包括哪些语言,只说包含“缅语、藏语、汉语和所有可以论证与这三种语言有亲缘关系的语言”(2014:12)。还说“他(Klaproth)明确排除了今天公认的台语支(例如泰语、老挝语、掸语)、南亚语(例如孟语、越南语、尼古巴语、高棉语)和阿尔泰语(例如日语、朝鲜语、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2014:12)。

以上的说法呈现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在Van Driem引用的那本书中,Klaproth根本没有提出Van Driem所说的语系分类。Klaproth只简单地提供了词汇表,提到了某些词的相似性,与不相似性,但他并没有进行任何有系统的比较。

第二,即使Klaproth在其他书中提到语系分类, Van Driem却也没有给出任何可以用来支持该说法的证据。Klaproth所进行的研究是在19世纪早期,在新语法派比较方法产生之前(该方法本身不用来判断亲缘关系——Nichols 1996)。Klaproth没有方法论,只是观察不同语言中看起来相似的词汇,列举了所有语言中的共同性(Klaproth 1823:36—39)。因为仅仅关注现代形式的相似性,Klaproth错认了一些伪同源词,例如汉语的“鼻”(转写为浊声母的bi)与波斯语bini“鼻子”;德语的Ohr“耳朵”与汉语的“耳”;汉语的“盘”与德语的Pfanne“锅”(他分了一般共性和具体的关系)。如果一个现代的学者使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估计会嘲笑到他无地自容,但是Van Driem却要求我们严肃对待这种做法。

第三,既然Klaproth没有方法论,只是简单地比较现代的形式,我们要怎么去评估Van Driem所说的“……所有可以论证与这三种语言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在一篇赞扬Klaproth的传记中,Walravens(2006:181)评论道:“Klaproth不善于创新却善于批评。他拥有惊人的语言能力,但是他对于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词汇方面,而不在

① Van Driem 在 2002 年和 2014 年的论文中都只引用了 Klaproth (1823) 的一本著作。

于比较或者语法。”德国的维基百科有关Klaproth的条目([http://de.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Julius\\_Klaproth](http://de.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Julius_Klaproth))这样写道：“Sein wissenschaftliches Werk galt bereits 191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ls völlig überholt und ist nur noch von literarischem Interesse.”（他的学术作品在1911年就已经被公认完全过时了，现在只存有一些文学价值。）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树立为权威呢？如果我们认他为权威，我们是不是也要认真对待他对有关圣经洪灾前后语言的讨论呢？（1823:42）

Klaproth唯一提及的大语系是他所谓的“跨恒河语言(Transganetischen Sprechen)”。他提供的该语系的名单(pp.367—405)包括越南语、泰语和缅语，所以Van Driem说Klaproth“……明确排除了今天公认为台语支(例如泰语、老挝语、掸语)、南亚语(例如孟语、越南语、尼古巴语、高棉语……)”(2014:12)并不符合Klaproth的原意。

我们能够承认的是在Klaproth的那个时代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而且他可能对于这个领域在那时的发展有贡献，但他当时没有我们现在可靠的语料和方法论，如果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果会比我们今天所做出的结论更正确，这种说法大有问题在。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该把Klaproth当作汉藏语系分类的权威。如果Klaproth是Van Driem所提出的观点的唯一证据，那么我们不能严肃对待这种观点。除了Klaproth学术权威的地位问题，逻辑上也存在问题，这种诉诸权威而不是以证据为依据的行为是一种诡辩性的论据，即只靠权威的论据(argumentum ab auctoritate)，是一种谬论。

2. Van Driem(如Van Driem 2002, 2014)的第二个主题在我看来似乎是对支持“汉藏语系”观点的学者们的“人身攻击”(ad hominem attack, 另一种诡辩性论据、谬论)。文中回顾了语言分类不同看法的发展历史，并且努力把某些观点，例如我们目前对于汉藏语系的理解，串联于19世纪某些德国类型学家的种族主义观点。他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就是含沙射影地污蔑认同“汉藏语系”这个观点的人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这是他的用意，那么这当然是滑稽可笑的。

首先，类型学者的种族主义观点与亲缘分类没关系，他们的观点与语言的类型分类有关系。

其次，我们之所以认同“汉藏语系”观点并不是因为受19世纪早期一些类型学者观点的影响；我们主要是受李方桂教授(1936—1937)对中国语言的分析以及本尼迪克特(e.g. Benedict 1972, 1976)和马提索夫(e.g. Matisoff 1973, 2003)对李方桂初期观点的比较研究的影响。Van Driem要么不了解李教授的影响力，或者选择不考虑任何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就因为这样才能把种族主义与藏缅语系连接。

3. Van Driem文章的第三个主题认为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支持“汉藏语系”这个观点的证据,所以我们就应当接受Klaproth的观点。这种说法是完全无视于对藏缅语系传统观点所做的一切研究,但是就算支持“汉藏语系”的证据不完全充足, Van Driem所提出的也是一种诡辩性的论据、谬论:“源于无知的论据”(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而且“转移了提供证据的责任”(onus probandi)。文中批评本尼迪克特“把汉语作为异类孤立出来”(2014:15),即没有把汉语当作藏缅语的一部分,并且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汉藏语系的亲属模型,该模型的定义是缩编的‘藏缅语’,即包含了所有非汉语的语言……至今所有的比较性证据都支持Julius von Klaproth (1823)年的藏缅语谱系树,因此在认识论上还是处于默认的模式。”(p.16)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汉藏语会议的早期议题和有关本尼迪克特的汉藏语纲要(1972)的争论经常是关于汉语是否跟藏缅语有同源关系(可参看本尼迪克特的讨论,1976)。这些争论让我们了解到学者对汉语的看法,认为汉语跟藏缅语多么不同。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本尼迪克特不仅论证了汉语应该成为汉藏语系的一部分,而且论证了该语系的第一个分界点应该在汉语和藏缅语之间。<sup>①</sup>对这方面的论述还可以参看LaPolla(2012a)对汉语和藏缅语同言线的讨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最初分隔已从民族迁徙历史研究得到佐证。根据LaPolla(2001)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汉语和非汉语语种之间的最初分隔是由于原来住在黄河流域的部分人民朝着不同方向迁徙。后来形成藏语支的人从其他藏缅语中脱离出来,因为这一批人向西向南迁入青藏高原,而其他藏缅语支(分别在不同的时段)沿着河流、绕着青藏高原的南部边缘向西南迁徙。

关于论据的逻辑性,如果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学者没有论证汉藏语的分支,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断定,因为没有证据支持汉藏语系的说法就不对?这种说法本身很有问题,而Van Driem支持Klaproth的观点同样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所指的Klaproth的谱系树是对的,所以他如何能说如果某种说法没有证据那就一定是错误的呢?这就是自我矛盾。

4. Van Driem(2014:16)说“跨喜马拉雅语系”这个称谓,优于“汉藏语系”的称谓,因为地方称谓要好过以亲缘命名。LaPolla(2012)提出相反看法,认为地方名称忽略了民族迁移的历史,意味着该地区所有的语言都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所以不利于

<sup>①</sup> 迟至1990萨格利特(Sagart)教授也不认同汉语和藏缅语形成一个语系的观点,他认为汉语和南亚语系更接近,然而现在他认为“整个汉藏语,而不仅是汉语,形成了和南亚语系的亲缘体”(Sagart 2006: 208)。

我们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

Van Driem 提出“跨喜马拉雅语系”这个名称是因为他说这个语系“跨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北两边”(2014:16)。还说“在大约300种藏缅语中,大部分的语言和四分之三的主要跨喜马拉雅语系语组都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边”(2014:16)。这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说法,把像汉语这样大的语族与像日旺-独龙-阿农语(Nungish)这样本质上为单一语言等同起来。这样做导致有庞大但是内部有多样的语组的地区比有很多小的语种的地区似乎缺少多元化的错误印象,覆盖了这一地区的多元化。戴维·布兰德利(David Bradley)早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在印度文化圈内对不同语种会在最大程度上把它们归纳为不同语言,这样一来,关系密切又能互相通话的语种被当作是不同的语言;然而在中华文化圈却是相反的,许多相互不能通话的语种被归纳为同一个语言(Bradley & Bradley 2002; Bradley 2015; 另参看Poa & LaPolla 2007关于中华文化圈这方面的文化对中国语言保护方面的影响)。

这种由许多相互不能通话的语种被归纳为同一个语言的现象, Pelkey (2008, 2011) 提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发现在中-越边界普拉人聚居的四十几个村子有24种不能彼此通话的语言, 因为五十年代普拉人被定为彝族, 所以这些语言都归纳在一起、定为彝语的一种方言。实际上, 喜马拉雅山脉以东以北的地区语言多元化的现象更复杂。我们知道汉藏语系的原点是黄河流域, 因此这种语言多元化的现象是预料中的。对于藏缅语族语支的分类, 多位学者(例如Benedict 1972, Bradley 1997, 2002, Matisoff 2003, Thurgood, 2017) 曾针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的语言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类, 却未能得出像Van Driem所说的这么冗多细微的语群。可进一步参看Chappell (2015) 对于汉语言多元化的研究, 就能了解为什么图上的单一点不能代表语系的一整个语族。

Van Driem的观点还忽略了考古学和基因记录, 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已经证实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有人类居住的迹象相对较晚, 而且迁入青藏高原的人类来自于黄河流域(Aldenderfer 2007, Aldenderfer & Zhang 2004, Brantingham et al. 2007, Chen et al. 2015, Rhode 2007, Su et al. 2000)。往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发展同该语系的整体发展相比较晚(LaPolla 2001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所以要把这个语系称为“跨喜马拉雅语系”不但是对历史发展的误解, 也是对目前语言分布的误解。因此我认为没有合理的论据可以让我们改语系的名称。

5. Van Driem提出了该语系所谓的“落叶”模型, 即很多语群据说是像落叶一样飘“落”在它们现在的所在地, 而且之间没有必然联系(Van Driem 2014:19, 图5):





图一 Van Driem 的图 5 (2014:19)

这根本就不是亲属分类模型。它还忽略了民族迁徙的事实。即，这些族群并不是随意飘“落下”的；我们有历史记载显示，他们是分批一波一波地迁徙，进入同一个地区，正因为如此，影响了语言的分布和现状。图一也忽略了一些学者做过的严谨比较研究，对图中的一些语群在高一层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详细的讨论。

正如戴维·布拉德利曾向我指出（邮件，2015年1月12日），落叶模式“意味着（之前的）谱系树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去寻找，这种做法，不是比较/历史语言学。如果某些地区把语言分为很多细小的语群，那么该地区的语言密度将会看起来比较高；或者，反过来说，某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可能更有助于类似克里奥尔语的语群的形成（如Burling提出的Bodo-Garo, DeLancey认为缅语支也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多元化似乎会比别的地区低——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汉语，在过去的四千多年从黄河的上游一直扩散到整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清楚界限。”

6. Van Driem进一步讨论人口分散的基因证据。这和语言分组问题毫无正面关系，因为考古和基因证据没办法告诉我们那些人当时所说的语言，而且这些证据的时代离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汉藏语系语言的现状和分布太过久远了。Van Driem虽然也接受以上的这两点，但是他却还仍然继续妄图建立基因和语言之间悬揣性的联系。

基因证据只有一种负面的用法，例如，如果我们可以用基因来证明缅甸南部的缅语说话者基因上更接近孟人而不接近缅甸北部的人，那么基因证据就可以作为支持Bradley（1980）所说的有关缅语扩散到缅甸南部的说法。也就是说，北部说缅语的人在18世纪打败了南部孟人王朝以后没有大规模迁移南部，而是原来说孟语的人改说缅语。

### 三 结论

在科学的历史中，一般来说只有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现行的范式（理论体系）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要在有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学者才会放弃现行的范式去接受新的范式（Kuhn 1970）。在 Van Driem 的文章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或者比较好的替代方案让我重新思考对藏缅语系的理解，或更藏缅语系的名称。

#### 参考文献

- Aldenderfer, Mark. 2007. Modeling the Neolithic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avid B. Madsen, Fa-Hu Chen & Xing Gao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s 9)*, 151-165. Amsterdam: Elsevier. doi: 10.1016/S1571-0866(07)09011-2.
- Aldenderfer, Mark & Zhang Yinong. 2004. The prehisto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1950.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8.1: 1-55.
- Bauman, James J. 1979.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ergativity in Tibeto-Burman. In Frans Plank (ed.), *Ergativity: towards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419-433. London: Academic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Princeton-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I, James A. Matisoff, Contributing Edi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6.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2: 167-197.
- Bradley, David. 1980. Phonological convergence between languages in contact: Mon-Khmer structural borrowing in Burmese.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6: 259-67.
- Bradley, David. 1997.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classification. In D. Bradley (e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Bradley, David. 2002.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In C. Beckwith (ed.),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73-112. Leiden: Brill.
- Bradley, David. 2015. Minority languages, Vitality of. In Rint Sybesma (general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Brill Online, 2015.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5: <[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edia-of-chinese-language-and-linguistics/minority-languages-vitality-of-COM\\_00000443](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edia-of-chinese-language-and-linguistics/minority-languages-vitality-of-COM_00000443)>
- Bradley, David & Bradley, Maya. 2002.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Yi in China. In D. Bradley & M. Bradley (e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77-97.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Brantingham, P. Jeffrey,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 David B. Madsen. 2007.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s 9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129-150.
- Campbell, Lyle. 2003. How to show languages are related: Methods for distant genetic relationship. In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62-28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Chappell, Hilary. M. (ed.) 2015. *Diversity in Sinitic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F. H., G. H. Dong, D. J. Zhang, X. Y. Liu, X. Jia, C. B. An, M. M. Ma, Y. W. Xie, L. Barton, X. Y. Ren, Z.

- J. Zhao, X. H. Wu, & M. K. Jones. 2015.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347 (16 January 2015): 248-250.
- DeLancey, Scott. 1989. Verb agreement in Proto-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2.2: 315-333.
- Van Driem, George. 1997. Sino-Bodic.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3: 455-488.
- Van Driem, George. 2002. Tibeto-Burman replaces Indo-Chinese in the 1990s: Review of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Lingua* 111: 79-102.
- Van Driem, George. 2005. Sino-Austronesian vs. Sino-Caucasian, Sino-Bodic vs.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as default theory. In Yogendra Prasada Yadava, Govinda Bhattarai, Ram Raj Lohani, Balaram Prasain & Krishna Parajuli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285-338. Kathmandu: Linguistic Society of Nepal.
- Van Driem, George. 2011. Tibeto-Burman subgroups and historical grammar. *Himalayan Linguistics* 10.1: 31-39.
- Van Driem, George. 2014. Trans-Himalayan. In Thomas Owen-Smith & Nathan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11-4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ryer, Matthew S. 1986. Primary objects, secondary objects, and antititive. *Language* 62: 808-845.
- Klaproth, Julius. 1823. *Asia polyglotta*. Paris: Gedruckt bei J.M. Eberhart. (Available at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d=JmwIAAAAQAAJ&hl=en> and <https://archive.org/details/asiapolyglotta01klapgoog>)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0.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aPolla, Randy J. 1992a.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5.2: 298-315.
- LaPolla, Randy J. 1992b.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TBA* 15.1: 1-9.
- LaPolla, Randy J.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759-813.
- LaPolla, Randy J. 1994a.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LTBA* 17.1: 61-80.
- LaPolla, Randy J. 1994b. Variable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5.1: 131-173.
- LaPolla, Randy J. 1995a.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1)*,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1995b.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4: 1149-1185.
- LaPolla, Randy J. 1996. Middle voic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Pan-Asian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V, 1940-1954.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 LaPolla, Randy J. 2000.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3rd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angkok and Trang, October 2-6, 2000. (Published as LaPolla 2013.)
- LaPolla, Randy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R. M. W. Dixon & A. Y. Aikhenvald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225-254.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2.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and explanation in word order universals research. In Pan Wuyun (ed.), *Dongfang yuyan yu wenhua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the East)*, 204-237. Shanghai: Dongfang Chubun Zhongxin.
- LaPolla, Randy J. 2003.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2-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to appear in 2017.)
- LaPolla, Randy J. (Luo Rendi). 2006a. Lishi yuyanxue he yuyan leixingxu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ypology).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3.2 (March 2006): 27-30.
- LaPolla, Randy J. 2006b.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393-397. London: Elsevier.
- LaPolla, Randy J. 2006c.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7-9 July, 2006.
- LaPolla, Randy J. 2006d. 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as constraints on referent identification. In Tasaku Tsunoda and Taro Kageyama (eds.),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Festschrift for Masayoshi Shibatani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139-15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Luo Rendi). 2007. Yuyan leixingxue / gongneng yuyanxuepai shiyexia de yuyanxue tianye diaocha (A linguistic typology / functional linguistics view of linguistic fieldwork). *Yuyanxue Luncong* 36: 42-56.
- LaPolla, Randy J. 2008a. Constituent structure in a Tagalog text. Keynote presentation to the 10th Philippine Linguistics Congres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 Diliman, Quezon City, December 10-12, 2008. (Published as LaPolla 2014.)
- LaPolla, Randy J. 2008b. Questions on transitivity. Keynote presentation to open the Workshop on Transitivity,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21 August.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as LaPolla, Kratochvíl & Coupe 2011.)
- LaPolla, Randy J. 2012a. Comments 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 117-132.
- LaPolla, Randy J. 2012b. Once again on person-marking in Tibeto-Burman: A reply to DeLancey 20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6-28 October.
- LaPolla, Randy J. 2013a.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 Alan Timberlake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463-47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2013b.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In Tseng Chiu-yu (ed.),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Conference on Sinology*, 33-57. Taiwan: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14. Constituent structure in a Tagalog tex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6: 761-774.
- LaPolla, Randy J. 2016a. Review of *The Language Myth*, by Vyvyan Evans. *Studies in Language* 40.1: 235-252. doi 10.1075/sl.40.1.09lap
- LaPolla, Randy J. 2016b.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 Invited position paper for special issu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20.2 on descriptive vs. comparative categories, in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16c. On scholarship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Review article on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and Newell Ann Van Auk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6.3, in press.
- LaPolla, Randy J., František Kratochvíl & Alexander R. Coupe. 2011. On transitivity. *Studies in Language* 35.3: 469-491.
- LaPolla, Randy J. & Dory Poa. 2006.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 In Felix Ameka, Alan Dench, & Nicholas Evans (ed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269-29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Polla, Randy J. & Yang Jiangling. 1996. Dulong/Riwangyu dongci de fanshen he zhongjiantai biao zhi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 In Dai Qingxia et al. (eds.), *Zhongguo minzu yuyan luncong (1)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1)*, 13-34.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ress.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LaPolla & Yang 2005.)
- LaPolla, Randy J. & Yang, Jiangling. 2005.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 *Himalayan Linguistics* 2: 1-13.
- Li Fang-Kuei. 1936-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21-128.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3, 1973.
- Matisoff, James A. 1973. Notes on Fang-Kuei Li's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 471-474.
- Matisoff, James A. 2000. On 'Sino-Bodic' and other symptoms of neosubgroupit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3.3: 356-369.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ichols, Johanna. 199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s heuristic. In Mark Durie & Malcolm Ross (ed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39-71.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lkey, Jamin. 2008. The Phula languages i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 La Trob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Pelkey, Jamin. 2011. *Dialectology as dialectic: Interpreting Phula variation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22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Poa, Dory & LaPolla, Randy J. 2007.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In Osahito Miyaoka & Michael E. Krauss (eds.), *The Vanishing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337-3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nge, Donald A. Jr. 1992. On calculating the factor of chance in language comparis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82.1: 1-110.
- Ringe, Donald A. Jr. 1995. Nostratic factor chance. *Diachronica* 12: 55-74.
- Ringe, Donald A. Jr. 1996. The mathematics of 'Amerind'. *Diachronica* 13.1: 135-154.

- Ringe, Donald A. Jr. 1999.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scientific and unscientific methods. In Bryan Sykes (ed.), *The Human Inheritance: Genes, Language, and Evolution*, 45-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hode, David, David B. Madsen, P. Jeffrey Brantingham & Tsultrim Dargye, 2007. Yaks, yak dung, and prehistoric human habit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s 9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205-224.
- Sagart, Laurent. 1990.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ober 1990, Arlington, Texas
- Sagart, Laurent. 2006. Review of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truction*, by James A. Matisoff, 2003. *Diachronica* 23.1: 206-223.
- Su, Bing, Chunjie Xiao, Ranjan Deka, Mark T. Seielstad, Daoroong Kangwanpong, Junhua Xiao, Darn Lu, Peter Underhill, Luca Cavalli-Sforza, Ranajit Chakraborty, & Li Jin. 2000.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107: 582-590.
- Thurgood, Graham. 2017. Sino-Tibetan: Areal and genetic subgroups.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Valin, Robert D. Jr. & LaPolla, Randy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Se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ravens, Hartmut. 2006. Julius Klaproth: His life and work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Japan. *Japonica Humboldtiana* 10: 177-191.

(通信地址: 黄成龙 10008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宋 佳 10248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